

苏联当代诗选

乌兰汗 编选

苏联当代诗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23,000 开本787×944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3}{8}$ 插页2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200

书号10208·188

定价2.25元

前 言

生活中不能没有诗歌。

如同生活中不能没有悲哀与欢乐、爱恋与憎恶、斗争与妥协一样，生活中也不能没有诗歌。

诗歌是生活的写照，是感情的记录，又是斗争的武器。它表达了人们的希望和回忆、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感受。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诗歌能够最敏捷地反映出人世间重大事件，也能以寥寥数语道出人们共同的心声。我国古人早已用精炼的语言把诗歌的作用概括为“咏物言志”。

苏联人民热爱诗歌，苏联诗歌体现了苏联人民的精神，它继承了俄罗斯等古典诗歌的传统，走过了崎岖的发展道路。

我们从十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优秀诗歌中了解到沙皇统治下俄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胸中郁积的愤懑、争取解放的斗争与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从苏联早期的诗歌中看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排除万难建设新社会的忘我劳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诗歌向我们展现了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浴血

苦战以及庆祝胜利，纵情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欢乐场面。通过诗歌我们看见了茫茫的雪原、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和乡间的小路与池塘……当然，在各个时期我们也读到过游离于生活之外，无病呻吟的作品。

近三十年来，苏联诗歌又处于怎样的状况呢？

二十与三十年代，在诗歌世界里勇辟蹊径的革新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其他诗人，常常举行诗歌朗诵会。马雅可夫斯基不但朗诵作品，而且还回答问题，甚至进行辩论。这种做法一度中断，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在社会大变动中，它骤然复苏，并形成了传统。一九五五年九月苏联诗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诗歌日”活动。诗人们来到广场上、俱乐部里，在群众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来到书店里参加出售诗集，并与读者会面、座谈。从那时起，苏联每年举行一次“诗歌日”，而且苏联诗人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节日。一九五六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又分别创办了《诗歌日》丛刊。从此，除了一般文艺刊物以外，诗人又多了一块发表自己作品的园地。

五十年代，斯大林问题在苏联诗人当中，如同在全体苏联人民中一样引起了极大震动。苏联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人民在思考，诗人在思考，诗歌里也充满了思考：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道德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对社会和社会对人应负的责任问题、诗人在社

会中的地位 and 诗人的使命问题，等等等等。苏联报刊上对诗歌的现状展开了讨论：诗歌是处于高潮时期还是低潮时期，抑或是在正常的发展中？随着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又提出了：社会需要的是物理学家还是抒情诗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诗歌面临着新的形势，同时也充分地说明群众对诗歌的关心与要求。

苏联写诗的人很多。但苏联人并不认为写诗的就是诗人，所以他们说：写诗的人很多，可是诗人很少。苏联究竟有多少名副其实的诗人？从苏联历次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所公布的材料来看，出席大会的诗人的次数仅次于小说家，约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社会上还有一大批非会员诗人从事诗歌创作。苏联人曾用一句笑话形容诗人之多：诗人诗人何其多，每片树叶就有两人去讴歌。

本集作品的作者，是苏联人民公认的有代表性的诗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们先后活跃在苏联诗坛上。书中三十六名诗人，大体上可以代表五代人。

最老的一代，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已经发表作品，并在诗坛上占有一定的席位。他们出生在十九世纪，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早年参加过不同流派的文学团体，甚至起过重要作用，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

的唯美主义的主张。他们绝大部分已经过世。到了五十年代仍然健在并继续从事创作的老诗人中，我们介绍的是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诗人是别德内(1883—1945)和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的同代人，但走的是不同的路，代表的是不同的倾向。别德内和马雅可夫斯基积极迎接十月革命，自愿地听从党的号召，满腔热情地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写作。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却长期囿于狭小的个人圈子，吟咏个人的感情变化。进入苏维埃时代以后，这两位诗人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现实中，思想感情都有所触动，政治立场有所变化，也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他们受到的批判多于赞扬。到了五十年代，阿赫马托娃回忆她的遭遇时，写道：“足足有十五个美妙的春天，不许我从大地上爬起。”但诗人没有绝望，显示出一位正直的老艺术家探索真理、努力认识现实的勇气与气质，她以难能可贵的毅力继续写作，毫不掩饰她的真实感情，正象她的诗中说的，大地给了她“神秘的力量”，因此，她不无自豪地表白：“人们还是熟悉我的声音，人们还是信赖我的语句。”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晚期作品与早期作品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语言趋向朴实，而且从内容来看，他们也在努力把个人溶化在集体之中，通过个人的抒情来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

与这两位诗人年龄相仿或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诗人。收入本书的有马尔夏克、安托科利斯基、吉洪诺夫、施帕乔夫、苏尔科夫、伊萨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他们出身于劳动人民或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热情地投身于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经受了考验与锻炼，诗歌成了他们斗争的武器，用吉洪诺夫的话来说，是“十月革命使我成了诗人”。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在复杂的斗争年代走过弯路，但总的情况是忠于十月的事业。他们受过高尔基的抚育，从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和叶赛宁（1895—1925）的诗篇中吸取过营养。他们的创作各有特色，曾经风靡一时，后来和五年计划时期的诗人的作品汇合成一股巨流。革命的风暴和战争的烽火锤炼出他们坚定的信念，所以到了晚年他们的诗歌没有减少当年的锐气，没有脱离自己所遵循的创作道路。当各种思潮泛起时，这些老诗人没有退却，没有因为自己写过助长个人迷信和粉饰现实的诗的错误而背叛自己的过去。普罗科菲耶夫说得直截了当：“我承认：生活中有许多事物我不曾见闻，我爱的不得其人，有时恨的也不得其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敢声明——对我终生为之服务的这片土地，我从不曾犯过任何罪行！”施帕乔夫用诗歌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写道：“我们将先后死去，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并未枉来人世。我们曾经在国际歌声中矢忠地

向列宁宣誓。”这些老诗人在回顾所经历的岁月时，以充满智慧和真实情感的抒情改正了曾经或多或少地把诗歌当作政治观点的图解的简单化倾向。他们在评价历史时是审慎的，对待自己的过去是严肃的，教导新一代是认真的。吉洪诺夫说：“我们的时代将会过去。所有的档案都得公开。过去历史中掩藏的一切秘密曲折，是光荣，是耻辱，都得向世界揭示出来。到那时，有些神的光彩将会剥落，裸露出一切不幸和悲伤，然而，当时确属真正伟大的业绩，将永远作为伟大的业绩，万世流芳。”老诗人的感情真挚而又深沉，没有粉饰也没有抹黑，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位老诗人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广大人民的声音，因而它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十月革命培养起来的这一辈诗人的创作，思想明确，积极向上，诗意隽永，语言通俗，对社会的发展有辩证的观点，崇尚俄罗斯传统的审美观。

第二代是五年计划时期涌现出的诗人。本书中的鲍科夫、格里巴乔夫、多马托夫斯基、马尔蒂诺夫、米哈尔科夫、纳罗甫恰托夫、西蒙诺夫、斯鲁茨基、斯麦利亚科夫、塔季扬尼契娃、特瓦尔朵夫斯基、费奥多罗夫都属于这一代诗人。他们进入诗坛的时间有早有迟，成就与影响也不相同，但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来自农村、工厂和部队。苏维埃政权使他们有机会受到新的教

育。作为五年计划中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满怀激情与自豪感颂扬新的时代、新的人物和新的道德风尚。他们的创作充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的优秀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阅读他们当时的诗歌可以呼吸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气息。在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们作为战地记者、政工干部、军官或其他人员活跃在各个战区。他们以高亢的声调歌唱了正义战争、指战人员的必胜信念与乐观主义。他们的作品起到了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战后，由于苏联个人迷信的不良风气的发展，有些诗人本身受到它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的创作散布了这种影响，口号多于真情，以粉饰现实掩盖严峻的生活。时间已将其中的部分作品自然地淘汰了。如今，经过坎坷的道路，他们已逾花甲而近古稀，不仅常常重温充满浪漫主义的青年时代，同时也不能不正视生活的教训。他们以深沉的语气倾诉自己的心境，以过来人的身分研究道德的标准。他们的晚期作品促进了抒情诗与哲理诗的发展。

格里巴乔夫在《关于从一个高地撤退的回忆》中写的是作者在战时强占了一个高地，但由于无力坚守，又不得不撤退下来。这个历史教训使他不得安宁，因此，他“常常在夜里，在临睡之前，记忆就忧郁不安地对我说起：不要去强占坚守不了的高地，免得

再使它不光彩地失陷。”这首抒情诗用平凡的语言、平凡的故事说出不平凡的真理：凡事应量力而行，切不可超越客观实际可能而盲动。不管从事什么事业，冒进的结果还是退回到原位去。

塔季扬尼契娃是长期生活在乌拉尔工人中间的女诗人，她的哲理诗含蓄而深沉。在《“是”和“非”失去了色彩……》一诗中，她写道：“……在动乱的年代，却出现令人可悲的事情，即使骄傲、勇敢的人，有时也让‘是’代替了‘非’……”我们不知她指的是苏联什么时期，什么事件，但历尽沧桑的读者从这样的诗句中，对诗人的心境当是不难理解的。

这一代诗人中，米哈尔科夫的寓言诗是值得重视的。他常常以拟人化的动物来讽刺、抨击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和人们的变态心理。例如《狮子和标签》一诗，明明是一头威震山岳的雄狮，只因为尾巴上被挂上了“公驴”的标签，弄得别的动物不敢称它是狮子，甚至连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了。诗人最后说：“寓言的含义就是这样：标签比狮子更有力量！”一张小小的标签，制服显赫的力量，看起来可笑，想起来可悲，难道社会上这类事实还少吗？读这类寓言时，不能不让读者有所思考……

多马托夫斯基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组诗《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革命激情与战斗精神。在政治动乱的年代，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毫不掩

饰自己对时代的看法。他在《没有举行成的葬礼》中，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刻划了社会上出现的阿飞流氓的污浊灵魂。一群不学无术的青年、酒会的常客、狂舞的干将，还有自命为革新派的颓废家伙，要为一位过去参加过修建地下铁道的工人、战时当过中校的军人举行葬礼。但，这群寄生虫不会使用刨子、凿子、锤子，不会钉棺材，连挖个坟坑也不会，所以死人不得不从棺材里爬出来，“给自己挖最后一个掩蔽壕”。诗人最后说，“让这些未老先衰的人埋葬我，我对他们怎么也不能信任。死人气得破口大骂，死人复活了。他有负于时代，无负于你们！”鲜明的立场、铿锵的语言，作者毫不含糊地表白自己对社会上出现的一批背叛革命传统的青年的看法。如果说这首诗具有公开争论的政论性质，那么《火烈鸟》则通过比喻的手法表白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一旦警报声起，那么他，就象火烈鸟一样，平素显得灰溜溜，这时就会腾空而起，张开翅膀，显露出殷红的颜色（火烈鸟翼下呈红色）。

然而并非所有第二代诗人都是如此。在四十年代苏联诗坛上卓有影响的特瓦尔朵夫斯基，由于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有悖于苏联人民的基本信念、有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而名声下降。此后，他没有再发表有分量的长诗。只是他在生平的最后几年里写的一些短诗，流露出发自深

心的感叹，情真意切，有血有泪，仍不愧为出色的抒情诗。

战争年代培养了苏联第三代诗人。一九四一年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领土，当时这批未来的诗人们还在中学读书或毕业不久。战争改变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他们离开校门走向战场。他们在红军队伍中是普通列兵、护士或下级军官，以自己血肉之躯争取过战争的胜利。他们中间有万申金、维诺库罗夫、德鲁尼娜、伊萨耶夫等人。万申金是用这样的诗句描写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我们是在战争之前或战争起始就参军作战的战士。黎明时分随警报起身，我才二十岁，二十一岁。接着，二十二岁，抖擞精神踏上征途。马上就是二十三岁。为了祖国免遭烧杀掠夺，为了从苦难中解救俄罗斯，我们这些还不太懂事的年轻人站入队列——已是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年纪。”至于把战时生活写入诗篇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战争成为他们生活的学校，使他们了解了祖国、了解了人民、了解了自己。他们活了下来。悼念为祖国捐躯的战友，成了他们写作的重要内容。正象德鲁尼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三十年来我做的事如此之少，可是希望做的事很多很多！如今我生存的任务、目的和意义，在于使你们，阵亡的烈士们，复活。”战后，这些年轻的文学家有机会进入高尔基文学院，接受专门教育。他们基本上保持了苏联传统的诗歌

写作方法与表现手法,用德鲁尼娜的话来说,即:“永远保持个人的本来面目——不受时髦的文学风气诱惑,不追逐虚假的锋利话,不在主题上投机,不以艺术的现实性来为艺术作品的软弱无力辩解。”但在描写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则与前一代诗人有所不同。他们更注意揭示战士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上复杂细微的变化,从中做出哲理的阐述。他们用今天的眼光审视过去的战争,又以战时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一年比一年远去,一年比一年近移,我们那峥嵘岁月,我所见不到的朋友兄弟。请不要说这是幻影,每一根神经都把往事铭记。我象在两个空间中生活:七十年代和一九四一……战火在我身上不会止熄,处处珍视着军人的荣誉。我用战壕的尺度衡量友谊,——看谁是朋友,侦察时可以同他在一起。”德鲁尼娜在这首抒情诗里反映出她这一代诗人的共同感受。这种感受带有普遍性,因而他们描写战争的诗篇能够引起今天的读者的共鸣与喜爱。当然,除了战争题材以外,他们也在其它题材上显示过自己的诗歌才华。

第四代诗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十月革命,对二十、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四十年代战时的前线生活,只有书本上的知识。当他们进入成年,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时,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动荡。在社会生活异常混乱、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

价、思想斗争极其激烈的五十、六十年代，他们带着新的声音、新的感情登上了诗坛。本书介绍的阿赫马杜林娜、沃兹涅先斯基、维索茨基、叶甫图申柯、卡扎柯娃、马特维耶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鲁勃佐夫、齐宾、费尔索夫就是这一代诗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喜欢在广大读者面前登台表演，朗诵触及社会敏感的问题的诗，被称之为“高声疾呼”派，如叶甫图申柯等。不过，时间过了不久，他们的作品也变成了当时政策的图解或传声筒。当听众对他们的作品感到腻烦时，又出现了所谓“悄声细语”派。“悄声细语”派的诗人中有鲁勃佐夫等人，他们主要是用纤细的诗句表露内心的感受，让人们在阅读中品尝其诗意。他们都写出过受人欢迎的作品，同样也发表了遭人唾弃的糟粕。叶甫图申柯的《虚无主义者》在第四代诗人中是早期有过一定影响的短诗。诗中刻画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写照。这是苏联诗歌史上的一个新型人物。很多人厌恶他，把他斥之为“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缺乏“俄罗斯人的趣味”，因为他喜欢穿细腿裤子、阅读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因为他不喜欢过去的苏联美术研究院的院长阿·格拉西莫夫，而崇尚西方画家毕加索。针对这种情况，叶甫图申柯有意识地把自己主人公安排在一个非常情况下，让他在北方避暑时为了营救一位落水的同志，而献出自己的青春生命。作者的思想是

明确的：这样的小伙子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者，而是英雄，在必要时他随时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也许作者是通过主人公的献身表白他们这一代人内涵的高尚精神。虽然有人对这样的主人公持另一种看法，但叶甫图申柯的这一类诗毕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而得到了社会上的肯定。这一代青年作者，有的人生活阅历有限，思想境界不够高，盲目追求形式，盲目崇拜西方，把本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诗歌的流派视为珍品，对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对人民生活没有兴趣，他们从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把个人描写成螺丝钉，而变成标榜自我，把表现自我看成是当代诗歌的主流。他们的诗里离不开“我”，通过“我”又折射不到广大的世界，他们崇尚自我，以至自我扩张，作无病的呻吟……这样的作品为愈来愈多的读者所厌恶。苏联评论家梅特钦柯在《继往开来》一书中分析某些青年诗人创作上的失败时说：阿赫马杜林娜、沃兹涅先斯基和叶甫图申柯有些作品之所以失败，“不是缺少才华（他们三人都有才气），而是立场不稳。他们属于自我中心的艺术家，世界在他们的主观反映上是被拔高了的，他们对世界上事件发生的过程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便制造了小‘我’与现实的矛盾；这就妨碍他们去正确了解现实的客观复杂性和真实的矛盾。世界的复杂性有时被说成是当代所特有的迷惘，在是非之间的奔波，有时被看成是斯芬克

斯提给诗人的不解之谜……”第四代诗人的创作正在新的形势下摸索着前进。

本书选译的作品中有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政论诗、讽刺诗、寓言诗，还有近年兴起的吟唱诗。本书以短诗为主，也选登了三部长诗的片断。本书为三十六名作者写了简短的介绍，在介绍老诗人晚年作品的同时，还选登了他们早年的部分代表作。这样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诗人创作的全貌。如，要了解阿赫马托娃，只读她五十年代以后的诗是不够的，还必须读一读她一九一七年写的《我听到有人宽慰着我……》等，欣赏伊萨科夫斯基与西蒙诺夫的诗，不能不读一读他们那风靡一时的《卡秋莎》和《等待我吧……》，读施帕乔夫的作品，就应当知道为他后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的短诗《洗衣妇》，如此等等。

本书译者有翻译界的老前辈。他们长期从事诗歌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书中所刊载的译文大部分是他们的译，使本书保持了一定的质量。有几位译者本人就是诗人或作家。他们的译文别有特色。他们根据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既严肃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又在必要时做了合乎诗的规律的变动。这是一种有所发挥的翻译方式。本书另有些译者是

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教学人员。他们的译文强调忠实于原文，同时在翻译技巧上进行新的试探。本书还有几位青年译者，他们是俄文诗歌翻译界的新生力量，他们第一次把自己的译诗捧给敬爱的读者请教。

译诗——是一桩艰巨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诗，只有原作才能表达它的全部内容、它的思想意境、它的音乐感、它的奥妙与美。译文无论如何精彩，也不可能保留原诗的全部特色。把多音节的、用俄文写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的诗歌译成单音节的汉文，是不容易的。然而，我国翻译工作者具有中国人民传统的精神，他们是知难而进的艺术家的，不管原诗多么复杂、多么难懂，都吓不倒他们。原文愈是艰难，我国的翻译家愈要征服它，并在征服它的过程中体味创作上的喜悦，为文学翻译事业积累难得的经验。本集的译文没有统一的风格，而是本着百花齐放的原则，让译者各显神通。这些译文的水平不一，对原作的理解和中文的表达都可能有错误，在作品的选择上也会有不妥之处，尚望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有诗歌。我们不但要欣赏祖国的诗歌，也要欣赏外国的诗歌。这些外国诗歌象一面镜子为我们映照出另一个世界。看看那个世界